

德主刑辅 以德化人

——中华传统德治理念与实践

□ 王学斌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所谓“轴心时代”，大致意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古典儒家的“明德慎罚”思想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关键阶段，恰如王国维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作为该阶段制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制礼作乐，将“明德慎罚”确立为周朝立国指导标准，并演变为后世治国理政最核心的思想原则之一。“明德”，就是提倡崇尚与敬畏德性；“慎罚”，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滥杀无辜。德是罚的指导，罚是德的辅助，二者主次虽有别，但缺一不可。此主张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古代治国方略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起，孔子、孟子、荀子、贾谊、董仲舒等诸大儒对该主张不断加以诠释、完善、充实与创新，形成了以“德主刑辅、以德化人”为特质的德治理念。

春秋时期，周公所指定的那一套礼乐秩序失灵并趋于崩溃。遭此世变，孔子倡导为政以德、刑法为助。按照萧公权先生的说法，“孔子所举之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换言之，在孔子视阈中，德是第一位，他主张“亲亲”与“举贤”相结合，不可偏废，故而他听闻晋国执政魏舒选贤与能，称赞其“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同时，孔子口中之“德”，更多是君子之“德”，更多侧重强调当政者应具备的素养，所以为政以德贵在当政者以身作则，他当年告诫鲁国大夫季康子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是此意。由政德不断向外延伸，必然涉及与刑罚的关系问题。对此，孔子态度极为明确，德可以防患于未然，而刑只能惩办于犯罪后，

依据此先后逻辑，他认为应先教后诛，先德后刑，“不教而杀谓之虐”，实属非常不道德不理智的治理方式。也正是基于该思想原则，孔子强调当政者须重视教化，“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就是教化所结之善果。

与之衔接，刑罚亦不可废弛，当秉持“宽猛相济”的原则。当时郑国盗贼猖獗，统治者出兵剿灭，最终“尽杀之”。就此事件，孔子并没有进行谴责，反而夸奖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可知孔子对于德刑二者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很透彻的。既然刑罚乃不得已而为之措施，那么更应谨慎，孔子于是提倡刑罚适中，毕竟“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倘聚敛无度，严刑滥法，会使本已混淆的秩序更加不堪，故当政者理应执法时不枉不纵、公平无私。尚德，崇教，垂范，秉公，孔子的学说可谓将“明德慎罚”理念推进了一大步。

身为孔子私淑门徒，孟子俱传孔氏之学，在德刑关系上大体上亦步趋，认为实施仁政的枢纽在于“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因而国君应尊贤能、省刑罚、薄税敛、重教化。到了战国末年，荀子兼采法家，集儒家学说于大成，对儒法问题有了新的发挥。荀子承继孔孟礼治思想，同时讲求礼法合用。他承认借助礼义教化，可以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的效果，然而天下毕竟仍有教而不化之徒，这就需用法律和刑罚来加以裁断。因此，荀子主张执法必须果决，“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如此先礼后刑、先教后诛，才可使“民归之如流水”“刑一人而天下服”，实际上体现了他隆礼重法、王霸并用的思想倾向。

秦汉易代催生“德主刑辅”理念的成熟

历史的轨迹往往不会依照思想

家拟定的学说而运行。秦朝以更为为师，采用法家学说，一统天下，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治思想并未成为主流。不过暴秦二世而天的教训，引发了汉代当政者的思考。比如汉初的贾谊，就深刻认识到德刑不可对立，“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因此必须德刑并施，礼法共用，“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仍以德治为主。

经过数代学者不断思考和积淀，“德主刑辅”理念到了汉武帝时期臻于成熟，总其成者是董仲舒。董氏鉴于秦亡教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汉初政治凋敝不堪，“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因此必须改革，其中关键举措就是将儒家德治理念引入治国理政的主流原则当中。董仲舒的主张可简括为一句：“任德不任刑。”一方面，他认为所谓德治不是强迫百姓成为圣人，而是要求统治者须有政德，如此由正君主、正朝廷逐渐正百官、正万民，“以渐而至”。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领域并非全然不顾刑罚，“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犹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二者犹如鸟之两翼，不可偏颇。要之，董仲舒所主张的“任德不任刑”并不打算在刑事层面细究教化与刑罚的作用孰轻孰重，而是针对当时“刑治”思想中所遗留的暴秦因素，进行彻底清算，从而恢复儒家“德治”之传统。“德主刑辅”理念也在这一系列清理与重塑的过程中，上升为一千多年来传统王朝治理论的核心原则。

从西周到西汉，虽然德治理念多有嬗变，不过其核心内容无非三方面。其一，立德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德治的首要与根本目标就是要论证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势必要规范既有的统治集团。于是，儒家用史书写作明定是非、褒贬君王，凭礼义规定秩序、界定君臣，以王道确定谁是正统，

谁是僭越。其二，行德治。学说必须赋予制度之中，才能发挥真实效应。具体而言，即要求当政者实行仁政，轻徭薄赋，杜绝严刑峻法等。其三，施德教。孟子曾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实施良善的教化固然是为了化民成俗，提高百姓道德素质，然而儒家提倡德教的立足点依旧是当政者，他们首先要勇于垂范，作出表率，才能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状态。

道术贯通方成就治世

治道虽好，更需落实到治术之中，最终达致道与术的贯通。“德主刑辅”升为治国理念后，为后代帝王所沿用，但实际历朝具体贯彻时差别甚大，因此导致的结局也大不相同。隋初制定《开皇律》时，隋文帝杨坚就敕令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要坚持将“导德齐礼”思想作为官方道德规范注入法律之中。不过现实中文帝本人并没有贯彻“德主刑辅”的理念，而是滥施淫威，甚至出台“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的法令，致使人人自危，冤狱不绝。待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深刻意识到“德主刑辅”的合理性，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可见他认识到一代统治周期之长短，德、法二者所起作用不同，长久延续以德，振衰起弊用法，故刚柔并济、德法兼采方是治国正道。所以李世民一方面倡导减免赋税、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对待作乱犯法之輩绝不姑息，比如皇叔江夏王李道宗因“坐赃下狱”，受到了“免官、削封邑”的严惩。贞观之治的出现，与该种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自西周提出“德主刑辅”后，该理念一贯贯穿于历代治国实践当中，虽然江山代有鼎革，国策屡经变迁，此原则从未退场，且深深渗透于各类制度里，沉淀为一种制度精神。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故持二心。”连一个老妇人都知道“汉王长者，终得天下”，刘邦的人品口碑由此可见一斑。宽厚长者，人缘好，这是刘邦的过人之处。

人无完人，一个人有毛病很正常，关键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毛病。毛病就是短板，所以要成就事业，一般来说要扬长补短。然而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改不了补不过来怎么办？那就要扬长避短。扬长避短固然不错，但短板终究是短板。不过凡事有例外，有的人有时候不但不避短，反而利用自己的短板，化短为长，这就是扬长用短了。刘邦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刘邦有好口碑，也有恶名声。刘邦的恶名就是爱骂人，爱拿人开涮。所以南官论治的时候高起、王陵一开口就直言不讳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的这个毛病许多人都指出过。萧何在举荐韩信登坛拜将的时候就说过“王素慢无礼”，要拜韩信为大将就要诚心诚意、郑重其事。刘邦接受了萧何的意见，庄重斋戒，沐浴更衣，用隆重的仪式筑坛拜将。看来刘邦虽然生性散漫，但需要认真守礼的时候还是能够做到。

恶名就一定带来坏影响吗？不见得。关键要看自己有没有自知之明，能不能化短为长。刘邦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缺点恶名转化为优势的高手。楚汉之争时期，九江王黥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策反黥布，刘邦派随何前去游说黥布。随何费尽口舌游说成功，带着黥布前来觐见刘邦。黥布抵达汉军驻地后，刘邦立即召见黥布。结果身为汉王的刘邦居然一边坐在床边洗脚，一边接见九江王黥布。这就很失礼了。黥布一看刘邦如此慢待自己，羞愤交加，后悔得恨不得自杀。但是，等他从刘邦的驻地回到刘邦特意为自己安排的客舍，发

古代官员非常注意官德的塑造。一方面，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作出很大的政绩。官德与政绩相得益彰，互相映衬。等到他们年老身弱时，他们在临终前遗嘱遗言遗书中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为官之品、为官之清、为官之得，旨在告诫后辈如何做一个好官员。

北魏名臣裴佗出身仕宦之家，自幼喜好读书，擅于研究。他走上仕途后，对自己要求很高，十分注重官德塑造和培养。在地方为官的时候，“所得俸禄，分恤贫穷”“郡民恋仰”。裴佗俭朴自持，“宅不过三十步”，而且能够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衣裘”。他每到一个地方为官，总是想方设法作出政绩。在他临终之前，裴佗给家中后辈留下遗嘱，“遗令不听请赠，不受赙槨（送给丧家钱财衣物）”。他的几个儿子都遵照这个遗嘱执行。从简短的裴佗遗嘱中可以窥见他为官之品，廉洁之风。

再如南朝名臣孙谦历任仕宋、齐、梁三朝，在不同岗位上，颇有政声。他博闻强记，“出为句容令”后，条分缕析地解决百姓难题，当地百姓“号为神明”；担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后，“布惠恩之化”，当地百姓被感怀，“郡境翕然”，他由此“威信大著”。孙谦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居身俭素”。在他92岁高龄的时候，自知身体不健，给孩子们写下了遗嘱，遗嘱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以感恩的心态对待自己应有的职位和官声，告诫后代子孙一定要从俭下葬，棺材可以藏身，墓穴能够置柩就可以了。在他死后，他的后代遵照他的遗嘱俭朴地办理了丧事，实现了他生前廉洁、死后节俭的意愿。

又如唐代名臣卢怀慎历任太宗、睿宗、玄宗三朝，生活俭素，清廉自守，“不营产业”，穿衣非常朴实，“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当时一个叫张星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奏皇帝，希望加赠物品给卢怀慎。于是皇帝赐给卢怀慎许多财物。卢怀慎患病期间，友人去看望他，发现他较为寒酸的处境：“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杯而已。”他的夫人崔氏评价卢怀慎：“清廉节俭，缓进而谦退，四方赠遗，毫发不留。”卢怀慎为官宽厚，谦逊待人，连司马光都发出了赞叹的声音。卢怀慎在临终前给唐玄宗留下遗书，向皇帝大力举荐宋璟等人，希望被皇帝重用。他告诫唐玄宗“望垂矜录，减加进用”。唐玄宗“深嘉纳之”。宋璟等人不负众望，促成了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

还如北宋名臣包拯，在考中进士后，辞官回家孝顺父母。“后数年，亲继亡”，包拯才选择出来做官。他

从古人遗嘱中见为官之品

□ 士 心

在朝中“立朝刚毅”，惩贪除弊，颇有政名。临终前，他在遗嘱中强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包拯要求将这条遗训刻在石头上，砌在堂屋东壁，“以昭后世”。从包拯的遗嘱中亦可看到其为官之清。

明朝有一个官员叫魏骥，做事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他担任松江训导一职的时候，“常夜分携箸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随后被召入朝廷，修撰《永乐大典》，认真参与撰写工作，顺利完成工作任务。魏骥“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退休后，他回到家乡，“戴笠行田间”，与乡亲们打成一片，教导子孙以孝悌之义和农耕之术，“增堤浚湖，捍御灾患”。当他在乡间的美德被朝廷得知时，朝廷派人前去慰问，使者 and 命令还没有到达乡间的时候，魏骥正好去世了。朝廷按照礼仪要求，对他要进行厚葬。但是，魏骥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能够俭葬。他的儿子魏完“以骥（魏骥）遗言诣阕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皇帝感慨地说：“骥（魏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历史散叶

贵自知之明 能知己知彼

——刘邦的成功之道（三）

□ 丁万明



扬长化短赢得人心

知人者智，自知之明。对领导者而言，知人善任是领导力的体现，但只知道用人还不够，打铁必须自身硬。刘邦没有项羽那样勇冠三军的个人硬实力，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很有自知之明。我们看历史，发现有些人很有本事，但是瞎折腾，结果死得很惨；有些人没本事，还瞎折腾，死得当然更快。刘邦深知论个人能力自己比不上别人。个人能力比不上别人怎么办？比不过能力就比人品。刘邦正是凭着“宽大长者”的好口碑赢得人心的。

刘邦为什么会得到入关灭秦的机会？当初，楚怀王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时候，楚怀王手下的老将们一致认为，之前与秦军作战，陈胜、项梁都失败了，因此不如改派敦厚老成的长者，以仁义为号召，不能再以暴制暴了。楚怀王手下的老将们都认为项羽勇猛绝伦，但是生性狡诈凶残，凡是经过之处，无不遭到残杀毁灭。所以项羽不可派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结果项羽去解巨鹿之围，啃硬骨头，这才使刘邦占据了先入

不想背上背弃盟约的恶名，于是就策划刘邦的安置问题。项羽君臣认为：“巴、蜀两地道路艰险，是秦朝时期被流放的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宣布：“巴郡、蜀郡也是关中的土地。”项羽便分封刘邦为汉王，统辖巴、蜀两地和汉中郡，建都南郑。其实自都江堰修成以后，巴蜀已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身为项羽重要智囊的范增凭借几十年前人们对巴蜀之地的印象认知把刘邦安置在那里，无形之中把最好的根据地双手奉上。楚汉相争项羽君臣首先就先输在不掌握大数据这一点上。

刘邦用的人是知己知彼的行家里手，刘邦自己对对手的研究也极其深刻。彭城之战大败之后，魏王豹又反水背叛了刘邦。刘邦命韩信、曹参、灌婴一起发兵攻打魏王豹。这个时候的刘邦实力还不够强大，所以他非常谨慎，他问酈食其道：“魏国领兵的大将是谁呀？”酈食其回答说：“是柏直。”刘邦说：“这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怎么能抵挡得了韩信！”又问：“骑将是谁啊？”酈食其答：“是冯敬。”汉王说：“他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贤能，却也无法抗得住灌婴的冲击。”接着再问道：“步兵的将领又是什么人呀？”酈食其说：“是项它。”刘邦说：“这个人抵挡不了曹参。如此我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啦！”这番对话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刘邦对敌我双方将领的能力和背景都非常了解，体现了他知己知彼的特点。

